

台湾当局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及应对 (1971—1972)

李庆成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1972 年的尼克松访华,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重塑了台海地区的关系结构。随着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台湾当局受到巨大冲击,美台关系的基础也随之动摇。尼克松政府虽设法安抚台湾当局,一再保证对台防御承诺不变,与之“外交关系”也不会受到影响,但尼克松访华却使台湾当局的对美信任丧失殆尽。尽管如此,台湾当局并未出现过激反应,因应措施也较为克制,原因在于其能反制美国的“筹码”有限。美国政府为确保尼克松访华成功及其访华成果不受影响,对台湾当局恩威并施,在设法安抚的同时,警告其不得采取妨碍尼克松访华的行动。尼克松政府对台湾的“背弃”行为,使台湾当局注意力从“反攻大陆”转移到岛内发展。

关键词:尼克松访华;台湾当局;美台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4-0167-10

收稿日期:2020-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6 年度项目“美台‘断交’研究”(16BZS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庆成(1978—),男,安徽长丰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史。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仅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关于尼克松访华,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充分关注,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但作为尼克松访华事件中受到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台湾当局,在此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的研究尚显不足^①。本文尝试利用已解密的美和中国台湾地区档案文献等资料,对台湾当局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充分的关注,对台湾当局因应尼克松访华的策略、措施及背后原因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 台湾当局对“七一五公告”的反应与美国的安抚策略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后,美国政府曾打算放弃国民党当局。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却让美国杜鲁门政府重新意识到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并促使其改变对台政策,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在台驻军,恢复对台湾当局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援助,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同时亦防止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美国的这一政策

^①学界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谈及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或台湾的反应,如:李正楠、张杨《与缓和同轨——尼克松政府对台政策新探》,《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 年第 2 期;周忠菲《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5 年第 3/4 期;陈相甫《1969—1974 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政策的转变:以“外交部”档案为主的研究》,台湾政治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99—127 页。

目标在 1954 年通过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而进一步得以实现。^① 冷战时期,一方面,台湾当局与美国站在一起实行坚定的“反苏”“反共”政策,但蒋介石始终不愿放弃“反攻大陆”的基本“国策”,并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为此与美国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斗争。^② 另一方面,从 1958 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中国核武研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上出现分歧^③;至美国肯尼迪总统上台后,中苏矛盾逐渐公开化,这为美国政府试图缓和对华关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曾不断尝试缓和对华关系,但因受冷战战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及对华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改善。^④

1969 年,尼克松上台后,基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及美国深陷越战等国际政治现实,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逐步采取措施改善对华关系。然而,从尼克松政府公开表示要加强对华交流到具体实施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管制,从台海地区撤出巡逻驱逐舰到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从减少美国对台军援到严控援台高性能武器,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的每一个积极步骤,都会触碰到台湾当局的敏感神经,致使其不断向美国政府提出质疑与关注。^⑤ 经过两年多的相互试探,中美两国关系在 1971 年终于取得突破。1971 年 7 月 15 日晚,通过“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电视和广播,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布《公告》称: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将于 1972 年 5 月以前访问中国;同时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绝不以牺牲美国的老朋友为代价,也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⑥ 公告的发表,让世界为之震惊。台湾当局的震惊程度和受到的冲击,更是不言而喻。

在尼克松发布《公告》前 20 分钟,美方才通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7 月 15 日夜,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从加州西部的白宫通过长途电话告知沈剑虹,美国绝不背弃朋友,美方认为此举对美国的“友好国家”皆有裨益,美国总统将对美台关系更为重视,并对美台共同防御协定坚守不渝。沈剑虹当即表示对此深感震惊,并将立即呈报台北当局。^⑦ 沈剑虹在回忆录中直言:“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消息最初反应也是觉得难以置信。”^⑧

《公告》发布两小时后,台湾当局“外交部代部长”杨西昆在台北宾馆约见美“驻台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并提出抗议。杨西昆指出,就尼克松总统声明接受中国大陆邀请一事,他奉指示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台北认为此事是对台湾最不友好之行为,必将引起极端严重的后果。马康卫当即表示,他也是从广播中获悉此事,尼克松总统在其有关声明中曾提及“对此项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项新关系之行动,绝

① 相关研究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0 页;李洪波《美台矛盾研究(1949—2000)》,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冯琳《退台初期蒋介石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再探讨》,《史学月刊》2019 年第 8 期;林正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其对蒋介石“总统”反攻大陆政策的限制》,《“国史馆”馆刊》2016 年第 47 期;郝天豪、刘相平《退让与坚守:蒋介石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商签中的策略选择》,《台湾研究集刊》2018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刘子奎《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林孝庭、赵相科《1962 年“台海危机”背景探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肖如平《蒋介石“反攻大陆”中的“控苏”与“联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4 期。

③ 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5 期;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2 期;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④ 参见:张屹峰《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华东师范大学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刘子奎《遏制与孤立:60 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复旦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唐小松《论 20 世纪 60 年代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微开门”政策》,《学术探索》2002 年第 5 期。

⑤ 郎朗《1969 年中美关系解冻研究——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李庆成《美国台海巡防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解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朱卫斌、李庆成《台湾当局与尼克松政府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交涉》,《台湾研究集刊》2014 年第 5 期。

⑥ Richard Nixon, “Remarks to the Nation Announcing Acceptance of an Invitation to Visi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15, 197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nation-announcing-acceptance-invitation-visit-the-peoples-republic-china>;《公告》,《人民日报》1971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

⑦ 《外交一驻外单位之“外交部”收电(十六)》,《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161-014。

⑧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61 页。

不因之出卖吾人之老朋友”，所以此项行动绝非有任何对台湾不友好的意愿。^①与此同时，沈剑虹奉命在华盛顿向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表示美方的所为不仅对美台双方，且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将造成严重后果，台北对美方的政策走向表示忧虑。^②

美方在台湾当局获知消息的震惊阶段对其安抚的主要策略，就是强调尼克松在发表《公告》时表明的不会牺牲老朋友，中美关系改善绝不会以“出卖”台湾为代价。而台湾当局的反应，除了震惊，也只是对美提出抗议，并未采取其他措施。尽管美国外交人员以各种方式阐述美方坚守承诺，尽力为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转变进行辩护，但台湾当局不以为然，对尼克松政府的信任丧失殆尽。《公告》发表四小时后，沈剑虹急电台北，提出三个判断：一是认为尼克松此举的动机是否意在对付苏俄或为寻求来年再度当选无法知晓，但其不惜牺牲台湾的意图则属明显；二是尼克松已接受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国大陆，进而承认新中国或在不远；三是其所谓维持对台友好关系、坚守条约义务等，以后恐更不可信。但沈剑虹认为，台湾仍宜沉着应对，避免过分激动。^③沈剑虹的看法，代表了台湾当局对当时局势的基本判断，认为美国“牺牲”台湾已不可避免。

为应对“七一五公告”带来的冲击，并制定总体应对策略，7月16日下午，台湾最高决策咨询机构“总统府宣传外交综合研究组”(简称“宣外组”)举行第261次会议，“副总统”严家淦与会，就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作专案研讨。与会人员经讨论认为，就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一事，台湾除向美方抗议外，应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抗议美国政府，其目的主要是使美方重申对台协防承诺，至于公开声明，需顾及各方反应，可强调大陆混乱不安，并注意对岛内人心安定的影响。会议还认为，就尼克松宣布将于来年五月前访问中国大陆，未来形势发展尚未可知，但台湾在心理上应有所准备，宜保持冷静，不可造成恐慌气氛，应遵循蒋介石“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训示，对内安定人心，防止引起反美情绪。因此，宣传方面应力求平实，勿予渲染夸张，不宜刺激挑拨，尤其不宜谩骂，尤其注意勿激起反美情绪，要根据政府发表的公开声明予各报刊以指导。^④

此次会议决定了台湾当局应对尼克松访华一事的总体策略，即要保持台湾岛内人心安定，尤其强调对美交涉及宣传应力求避免过度刺激、挑拨，以免造成恐慌和反美情绪，搅动台湾岛内民心。这反映了台湾当局在应对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时的无奈和理性。因为台湾当局实际上没有与美国“闹翻”的资本，从根本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从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在安全和经济等事关台湾生存的重大问题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和协助。美国不仅与台湾维持着所谓“外交关系”，还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军并设立共同防御司令部，更把台湾作为支持美国在越战前线的后方基地。在冷战及海峡两岸长期对峙的背景下，台湾一直是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的前哨阵地。国民党的军队训练靠美国协助，武器装备靠美国提供，经济发展靠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无不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面对美国的政策转向，台湾当局即使感到被美国政府“出卖”，但可有效反制美国的手段却很有限。

台湾当局随后的行动基本上按此次会议所定的方针展开。7月16日，严家淦发表声明，对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大陆“深感诧异”，要求他取消此行。^⑤台湾岛内媒体的反应及民众在美“驻台大使馆”外的游行抗议，基本上是在台湾当局控制范围内。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华盛顿汇报说，台湾当局对尼克松《公告》的反应表明，台当局是采取克制态度的，其中台湾当局的众多表述涉及及要求与美国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期望和必要。^⑥

尼克松政府为安抚台湾当局，防止台湾当局出现过激行为，一方面有限地向台湾当局通报基辛格北京之行情况，强调美国遵守对台防御承诺，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以试图降低台湾当局的安全疑虑；另一方面尼克松和基辛格还通过强调个人与台湾的友好关系大打感情牌，以期获得蒋介石谅解。7月17日，尼克松致信蒋介石，对他发布的《公告》实质内容未能提前告知深表遗憾，并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维持与台湾的友好关系，继续遵守对台防御承诺。^⑦然而，蒋介石对此信的反应是：“尼克生小丑来函，彼派密使前往北平事前不及与我商谈

①《外交一周书楷陈长飞等与美方代表谈话纪录》，《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093-014。

②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45, pp.456—457.

③《外交一驻外单位之“外交部”收电(十六)》，《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161-014。

④《宣传外交综合研究组会议报告》，《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009-005。

⑤《美联社洛杉矶1971年7月15日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第343页。

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45, ft. 2, p.456.

⑦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46, p.458.

表示抱歉,余决置之不理,否则彼将宣传其出卖我国已得我谅解矣。”^①

为缓解台北的疑虑,避免台湾当局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7月27日,基辛格接见沈剑虹,向其通报北京之行有关情况,强调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及美国的对台承诺,并强调他们不会跑到北京去把台湾交给新中国。^②然而,通过研究基辛格在北京的会谈记录可知,基辛格在与沈剑虹会谈时,不仅未向沈剑虹透露他在北京与周恩来讨论的许多实质问题,甚至在很多涉台关键问题如联合国代表权、台湾的地位和前途、从台湾撤军等问题上有意隐瞒、欺骗沈剑虹。^③基辛格接见沈剑虹,目的就是要消除其疑虑,稳住台湾当局。7月26日,随同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基辛格高级助手何志立(John Holdridge),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沈剑虹受到了“七一五公告”相当大的冲击,并声称在未受预先警告的情况下遭受了来自尼克松政府的“卑劣的”对待,迫近的形势发展使他特别愤怒。因此,基辛格会见沈剑虹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消除沈剑虹的疑虑,通过沈剑虹敦促台北坚守在联合国,即使其安理会席位无法保住。^④

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正值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当局为确保台湾在联大席位和安理会席位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白宫的这一举动无疑对美台的联合国“保卫战”造成重大冲击和影响。然而,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由他促成的尼克松访华,给台湾造成的冲击完全在他们的预料之内。7月14日,基辛格回到加州,向尼克松汇报指出,他在北京的会谈是他进入政府以来曾经经历过的最彻底、最广泛、最重要的会谈,这将使苏联恐惧到极端敌对,并将引起台湾激烈动荡,但美国踏上这条道路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些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得到控制并时刻保持警惕,实行负责任的政策,风险就会转变为美国的优势;并且,美方可通过重申对台“外交关系”及《共同防御条约》,把对台湾的“伤害”控制在一定限度内。^⑤

二 尼克松访华前夕对台恩威并施与台湾当局的应对

尼克松可谓是台北的老朋友,从他年轻初入政坛开始,即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抱有强烈的同情和好感。从1947年担任国会议员到后来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期间,尼克松的中国观主要就是“亲蒋”和“反共”。1949年初,当国民党军队日益走向穷途末路之时,51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总统,要求给蒋介石更多的援助,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⑥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准备“放弃”台湾国民党政权,共和党为此指责民主党“丢失了中国”,其原因是“美国放弃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尼克松是“声音最大、最经常就这个问题批评政府的人之一”。^⑦1953年,尼克松就任副总统不久,首次访台,与蒋介石单独进行长时间会谈。^⑧1956年7月初,作为副总统的尼克松,再次访台,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恪守与台湾签订的条约义务。^⑨鉴于尼克松的“亲台”表现,蒋介石曾对其寄予厚望,予这位“亲台反共”的政坛新星以大力支持,并对尼克松赠予大量献金,以扶助他在政治上顺利发展。

正因为对尼克松抱有极大的期望,才使得蒋介石对尼克松的“出卖”行为难以接受,对其不断予以责骂,称:“今日混乱世界,是非不明,利害倒置,廉耻道丧,礼仪扫地,如尼丑者”^⑩，“寡廉鲜耻未有如尼丑之甚者,而其忘恩负义之作为犹其次也”^⑪。蒋介石认为:“今日尼丑所希望于我者,第一为老死与逼我自杀,第二为不作下届总统,第三为内部崩溃,此为自知其所不能也;以我非李承晚与吴廷琰可比且其所能加害于我者皆已为之矣,而其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7月1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尼克生”即尼克松。

②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52, pp.470-472.

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39-144, pp.359-455.

④John Holdridge provides Henry Kissinger wit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his meeting with James C. H. Shen, Jul26, 1971, CK3100525357, DDRS.

⑤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44, pp.453-455.

⑥Tom Wicker, *One of Us: Richard Nix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121.

⑦Richard Nixon, “Washington Report,” PPS208(1950), Richard Nixon Library & Birthplace, p.1. 转引自: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⑧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doc.155, pp.334-335.

⑨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I, doc.193, pp.397-403.

⑩《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8月4日(9月6日补记)。

⑪《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9月22日。

以使人无法忍受之奸计与耻辱,逼我自杀更是其不知我忍辱负重之民族性的妄想,以我自有其独立自强有志竟成之道也。”^①为此,蒋认为:“今后打破尼丑险恶阴谋之道,第一接受连任下届总统,团结内部,第二加强军事与国防科学,力求独立自保而已。”^②

1971年11月29日,基辛格举行记者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不会受到损害。^③翌日,基辛格再次举行记者会,介绍尼克松访华有关细节,重申美国对台防御承诺不受影响。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在北京解决台湾的未来问题时,基辛格答复称,美方的立场是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最终关系应该由台海两岸直接商谈解决,但“这并不损害已有的承诺”。^④

美方的公开承诺与声明,并未缓解台湾当局的疑虑。12月4日,沈剑虹给台北的电报指出,尼克松1970年4月29日曾表示台湾问题力谋由台北与北京谈判解决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而今基辛格却说美国立场为台湾地区和中國大陸的最终关系应由双方直接谈判解决。此为美对台政策又一新转变,美方采取“一个中国”的立场已接近北京的主张。基辛格虽重申美国对台承诺,但答询显示美已逐渐与台疏远,似不想让台湾问题妨碍美中接近。^⑤

蒋介石对美方这一立场高度警惕,因其始终坚持所谓“不两立”政策,美国对台湾前途的任何表态都会使其高度紧张。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会议员贾莱克(Cornelius Gallagher)访台,蒋认为其必为尼克松所指使。贾莱克与蒋经国会谈时,问及尼克松从北京返美后,台北和北京是否要举行最高层会谈,蒋经国当即予以拒绝并告贾:两岸“决无和谈之可能,否则等于自杀”。蒋介石认为,蒋经国对贾之答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⑥可见,两蒋对两岸直接会谈及美国立场转变的恐惧。

为稳住台湾当局,1972年1月1日,美国国务院指示美“驻台大使”马康卫,尽快向蒋介石转达尼克松致蒋介石的亲笔签名信。尼克松以总统名义向蒋介石解释他北京之行的必要性,并就有关问题作出保证。尼克松在信中要蒋介石完全相信,美国采取对北京的行动,不会忽视盟友和朋友的利益,也不会以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寻求和解,他会更多考虑台湾的利益,美国将信守所有条约承诺,包括与台湾的条约承诺,美国也无意脱离亚洲。北京的会谈将聚焦于影响美中两个政府的双边关系,考虑到存在于双边关系中深刻而复杂的分歧,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外交关系问题确信不会被提出讨论,他希望蒋介石能继续理解美方意图。^⑦

美国政府在电告马康卫向蒋介石转交此信的同时,要求台北不得公布此信内容。如果台北希望公布,美国国务院将会考虑授权发布信件的一部分摘录,但这些摘录必须提前发回美国国务院审核。^⑧美国担心台北借公布信件内容之机干扰尼克松访华之旅。蒋介石接信后认为,尼克松“虚言巧语,嘘声恫吓”,并拟定复信主旨,强调“威胁利诱,买空卖空,巧言令色”乃为中共的“惯技”,中共的“欺诈虚伪,言而无信”亦为尼克松所深知^⑨,极力提醒尼克松不要上当。翌日,蒋介石与蒋经国在车游时继续谈“尼函复信方式与内容要点”,认为:“决不提其往北平字样,乃以提醒其慎重行之。”^⑩两蒋明知无法阻止尼克松访华,提醒只能点到为止,尽其人事。

1月9日,杨西昆向马康卫转交蒋介石1月6日给尼克松的复信。蒋介石在信中感谢尼克松再次保证对台条约承诺并考虑台湾利益,而重点则在提醒尼克松:“以您的智慧、丰富的政治经历以及您对中共政权本质的深入了解,我确信您一定会完全认识到北京在其国际活动中的奸诈策略和诡计,我相信您不会被诱骗,我也相信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11月“反省录”。李承晚,1948年在美国支持下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并当选总统,1960年韩国发生革命,其统治被民众推翻,李承晚被迫辞职并流亡美国夏威夷,五年后辞世。吴廷琰,即吴庭艳,1955年就任南越第一任总统,1963年在军事政变中与其弟吴廷瑛被杀身亡。蒋介石认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促南韩民众之力以迫使李承晚下野致死”,肯尼迪政府“促南越军队杀害吴廷琰”,今日尼克松竟欲联合中共之力“消灭中华民国,不只推倒出卖蒋介石也”。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10月2日,第一周“反省录”。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12月1日。

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80, p.630.

④Text of Henry Kissinger's press conference, Nov. 30, 1971, CK3100690195, DDRS.

⑤《外交—驻外单位之“外交部”收电(十八)》,《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163-013。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1月11日。

⑦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81, pp.634—636.

⑧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81, pp.634—636.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1月4日。

⑩《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1月5日。

您在面对中共时所做出的所有决定,不仅要考虑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而且要考虑到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以及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①蒋介石不敢对美国直接提出抗议或谴责,只能采用离间的策略,通过指责或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此来提醒或告诫尼克松不能上当。蒋介石对尼克松访华之举可谓痛恨至极,但由于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的地位及复杂的政治现实,蒋介石并没有多少选择或回旋余地。

美国政府在安抚台湾的同时,又对其警告施压,以防止台湾当局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可能采取的干扰行动。1972年初,美国开始对台采取预防措施,基辛格同意美国有关部门监听监视台湾当局的潜在活动,提出:“如果(台湾)‘噪音水平’有任何增加,国务院应当要求马康卫拜见蒋经国,(向蒋经国)强调任何破坏活动,都是对尼克松总统无益的。”^②2月12日,马康卫报告国务卿罗杰斯称,他已按照指示将美国的要求告知蒋经国,并强调美国需要台湾当局的充分合作来确保尼克松访问中国的良好氛围,同时台湾要向美方提供任何包括间接影响尼克松总统安全或出访环境的信息。马康卫还向蒋经国明确指出,台湾当局对台湾岛内同情中国大陆的人采取的行动、台湾武装部队在沿海的活动,甚至是台湾在远离尼克松总统访问城市的那些地方的活动,都可能使台湾当局被指责为制造不良事件。蒋经国给出了绝对保证:台湾不会采取任何进攻性或挑衅性的活动。^③

在尼克松一行启程前往中国的前一天,即2月16日,基辛格又召见沈剑虹,希望台湾当局勿于尼克松访问结束时立即予以评论,美方将派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专程前往台北,向台北当局简报,他最晚也将在3月1日前与沈剑虹晤面。基辛格强调,中方最愿意看到的是美台双方相互指责,他保证美方绝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主张。^④

美国的强大压力,极大压缩了台湾当局的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手脚”已被美国牢牢捆住。1972年2月11日,台湾当局“宣外组”召开第257次会议,就尼克松访华的应对措施再次进行讨论。周书楷在会上表示,尼克松预计2月17日离开华盛顿访问中国大陆,台北计划于同日发表声明,此项声明应要言不烦,立场严正,不斗气,有分量,已在研究中。国民党第四组(负责欧美事务)主任陈裕清则指出,尼克松访华的时间恰与台湾“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日期巧合,与会代表宜针对此事发表严正声明,重申“反共复国国策”坚定不移的立场,以鼓舞民心士气。会议研究决定:(1)政府发表宣言有必要与“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正相吻合;(2)宣言内容应配合政府政策,但政府发言宜较稳重,“国民大会”代表宣言则应多宣扬大陆敌情,并为大陆同胞“请命”。^⑤显然,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施压和警告起到了其预想的效果。

尽管如此,为防止尼克松在北京可能达成涉及台湾权益的协定,台“外交部”在尼克松离开华盛顿的当天即以中英文抢先发表声明,表明其态度立场。声明妄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对无权代表中国大陆人民,美国与新中国之间凡由此访问所达成涉及台湾暨人民权益之任何协议,台北一律不予承认;台北相信尼克松总统当能洞察中共的本质,及其以谈判为斗争手段遂行其对“自由国家渗透颠覆之阴谋”,而不致为其所惑;尼克松总统迭次向台湾重申巩固美台友谊及履行条约义务,相信美国总统必将履行其历来所作的庄严保证。对于两岸统一问题,该声明强调两岸绝无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台湾“光复大陆之基本国策”也绝不改变。^⑥

台湾当局的声明,旨在重申“光复大陆”的立场,既不敢指责美国政府,更不能对尼克松访华有任何负面评论。究其原因,正如台湾驻美“大使馆”2月20日给台北“外交部”的电报所引的《纽约时报》报道所言,台北认为迁怒美国并无益处,反而可能动摇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信心,激怒在军援和经援领域帮助台湾的美国人。因此,台北对尼克松访华表面力求镇静,以警告美国切勿上当的方式表达台北的不快。同时,台北目前最关切的问题,乃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能否维持现状。^⑦

^①In a note to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from Chiang Kai-shek, Jan. 6, 1972, CK3100623499, DDRS.

^②FRUS, 1969 - 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82, pp.636 - 637.

^③FRUS, 1969 - 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82, pp.636 - 637.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及白宫的官员们都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侦查活动或类似活动会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复杂化。因此,在美国国务院要求下,美国军方在1971年11月已暂停在距中国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东岛(Woody and Lincoln Islands)至少12海里范围内所有海上和空中侦查活动。(Ibid.)

^④FRUS, 1969 - 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5, p.827; 钱复《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录》,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4页。

^⑤《宣传外交综合研究组会议报告》,《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009-012。

^⑥《外交一驻外单位之外交部收电(二十)》,《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165-068。

^⑦《外交一驻外单位之外交部收电(二十)》,《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165-087。

上述几点道出了台湾当局对尼克松访华一事所采取的态度和应对策略的背后原因,也点出了台湾当局的软肋和无奈。纵然台湾当局对美国接近中国大陆极度不满,然而他们既不能阻止尼克松前往北京,更不能由此而损害美台关系以造成他们无法承受的代价。台湾当局的主要关切就是美国对台条约承诺及美台“邦交关系”的维系。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维持对美关系仍是它对外政策的基础,也是台湾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台关系的基石,也是维系美台“盟友”关系的根本纽带,此乃台湾当局一再要求美国保证对台条约承诺的根本原因。任何影响或涉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事情,都会让台湾当局高度敏感和紧张,而这也成为美国政府安抚台湾当局的“良方”和“法宝”。

三 尼克松访华与台湾当局的应对

尼克松访华团队于1972年2月21日到达北京,正式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美国领导人首次访华,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尼克松团队在中国的八天时间里,双方举行了30余场会谈,其中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实质性会谈达到9场^①。中美双方经过一周的艰苦谈判,2月27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Ronald L. Ziegler)同日在上海发布联合公报的声明及新闻简报,基辛格和格林亦参加了新闻发布会^②。

尼克松访华期间,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尼克松到达北京当日,蒋在日记中强调中方的接待情形冷落,并将其形容为“一片侮辱阴沉景象”^③。尼克松和基辛格到达北京后,立即前往毛泽东住处与其会谈,但国务卿罗杰斯并未同行,这一举动被蒋介石视为“形同偷访”^④。蒋还不断推测尼克松和周恩来会谈情形,认为:“尼周会谈可以想到者第一为台湾问题,第二为越南问题,第三为苏俄问题,第四为中东以阿问题,第五为一般问题,此谓裁军问题,第六为结论。”^⑤27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后,蒋对美方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的“妥协”异常气愤,认为《中美联合公报》内容全是中共“一方面的一面之词,美尼不敢提其所应有之立场,对我中华民国皆以台湾代之,尼丑之无耻极矣”^⑥。蒋的日记内容,既流露出他本人对尼克松在北京会谈时的忧虑和惴惴不安,更体现出他对《中美联合公报》的不满。

28日上午,蒋介石研阅《中美联合公报》,感到“不胜愤慨”,认为“此为尼丑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抢告下届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并于当日下午召集高层会议,指示对《中美联合公报》加以驳斥的声明要旨。^⑦当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中美联合公报》。声明首先重申其2月17日的声明,声称新中国政府无权代表中国大陆人民,美中之间凡由此访问所达成任何涉及台湾及人民权益的公开及未公开之协议,台湾方面一律不予承认;其次,对《中美联合公报》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予以驳斥,污蔑其为新中国进行“对外渗透颠覆与武装侵略所施放之烟幕”;最后,对于《中美联合公报》中有关美中贸易、科学、文化、新闻等民间交流内容,该声明则妄称新中国一切对外活动均以统战为目标,此次邀请尼克松访问之目的,一则在离间并分化“民主国家”间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孤立和打击美国,二则是利用与美国的各种接触交流,以加强对美国内部的“渗透颠覆”,故美国与新中国接触交流不啻为“引狼入室”。^⑧台湾当局的声明,只能是借机指责新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的动机不纯,要求美国警惕,同时亦反映其对中美可能达成秘密协议的忧虑,担心美国背后“出卖”台湾。然而,它依然未对尼克松的访问提出任何批评或指责。究其原因,仍在于台湾当局承受不起美台关系遭致损害的后果。

尼克松为避免其访问成果受到影响,消除台湾当局及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疑虑,在访问结束后及时就有关问题作出表态。2月28日,尼克松总统返抵华盛顿安德鲁森空军基地,并在机场发表演讲,指出他们并未带回

^①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194—204, pp.677—824; Volume E-13, Document on China, doc.88—107.

^②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3, ft. 2, p.816.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2月21—22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2月22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2月24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2月27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2月28日。

^⑧《尼克森“访匪”杂卷(1972年2月28日)》,第29—30页,台湾“外交部”档案(1928—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405.22/0009。

任何成文或未成文的协定可以保证他们时代的和平,然而他们开启了中美两国在贸易、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的交流和联系,达成了在亚太地区降低对抗风险的国际行为准则以及国际争端不应通过武力解决的共识,并同意把这些原则应用于相互关系之中。关于台湾问题,尼克松指出,他们陈述了美方的既定政策,即美国的海外驻军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步减少,随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方的最终目标是撤回所有军队;美方曾答应不会在背后协商其他国家的命运,他们在北京也没有这么做,没有任何秘密交易,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未放弃美国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承诺;他们没有尝试去掩盖美中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分歧,因为这些分歧确实存在。^①

尼克松的表态意在安抚盟友,特别是要缓解此次访华给台湾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当然,尼克松仅通过声明重申其信守条约承诺,显然无法缓解台湾当局的疑虑。蒋介石在获悉尼克松的演讲后就指出:“观察尼丑返华府后所发表之谈话及其一般情形,其第一句话为坚守台湾之承诺并未违反美国之原则云,谁其信之。”^②

为尽快安抚台湾当局,基辛格返回华盛顿的翌日(3月1日),即接见沈剑虹,从美国对台防御承诺、台湾地位、美军撤台、美台关系等七个方面对沈剑虹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和说明。第一,关于美国对台防御承诺,基辛格指出,尼克松总统在访问北京时没有放弃任何承诺,美国对台防御承诺在基辛格上海记者会、尼克松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的演讲、尼克松向国会领袖的报告及该日新闻简报中多次得到重申。第二,关于台湾的地位,基辛格表示中方的立场是它代表全中国且只有一个中国,美方的理解是北京和台北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美方对中方声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的这一声明被台北理解为美国承认新中国对台湾的要求是愚蠢的,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第三,关于《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美国从台湾撤走所有军事设施,基辛格表示《中美联合公报》并不是条约,因此最好就是保持语言模糊。第四,关于台湾的前途,沈剑虹想知道周恩来想要哪一种方式和平解决。基辛格回应称,周恩来想要与蒋介石协商,但美国不会提供好的场所,美国既不鼓励也不阻碍这样的协商,美国不会向台北施加压力,美方将刻意避免发挥任何调解人的角色。第五,关于美台关系的未来走向,基辛格表示美国将保持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美国的目标不是要“清算”台湾,也不是要逃避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目标是在一个新的方向上推进与北京的关系。^③

基辛格还就沈剑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未提及美国对台防御承诺、未使用“中华民国”名称、《中美联合公报》胶着的原因及症结等问题作出回应和解释。基辛格指出,新中国政府已经克制未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攻击美国的防御承诺,而且中方曾表示不会签署含有美国重申其防御承诺的公报,美国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国家一定要在公报里提到这种承诺。就《中美联合公报》胶着的原因和症结,一是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撤出的速度和性质,即美方坚持要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及降低紧张局势的前景联系起来,二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的解决应该与美国武装力量撤出的立场一致。基辛格强调,中方在最后一晚作出了所有让步。这显然是在“糊弄”沈剑虹,意在强调美方已在台湾问题上维护了台湾当局的利益,迫使中方作出了让步,以尽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基辛格甚至还为台湾当局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表示未来五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会过世,这会引起中国巨大的动荡,中苏冲突也可能发生,因此美国与台湾把关系保持到那时最为重要,他不相信中国大陆在未来三到四年内会攻击台湾,因为其不具备所需要的军事能力。沈剑虹予以赞同,表示在苏联压力下北京不可能胜利完成这样一场军事战役。^④

沈剑虹对于基辛格的保证、解释和说明并不满足,翌日又拜见国务卿罗杰斯,对与基辛格讨论过的许多议题进一步探询,极力寻求相关问题的答案和真相,尤其是美国对台防御承诺问题。罗杰斯指出,尼克松此行一切皆按原定计划进行,没有意外增加或减少行程安排,讨论台湾问题虽系重要部分,但实际上乃是双方“各说各话”。总之,美国与新中国改善关系并非外交承认,美与新中国交往仅限于文化、科学、记者、贸易以及不定期外

① Richard Nixon, “Remarks at Andrews Air force Base on Returning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8, 197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andrews-air-force-base-returning-from-the-peoples-republic-china>.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972年2月29日。

③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5, pp.825—830.

④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5, pp.825—830.

交人员接触,任何“友邦”皆不必对尼克松此行存有疑虑,此行确无秘密协定或“暗盘交易”。沈剑虹还就美国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说法、美台“外交”关系状况、美国对台军援、联合国代表权、美国对台湾称呼等问题向罗杰斯发问,罗逐一回应,表示美方对于台湾官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审慎反应至为感激,他愿保证此后继续加强美台友好关系。罗杰斯还提到尼克松在《中美联合公报》定稿后曾向他表示,这一公报的发表对尼克松在台湾的朋友将是一大打击,尼克松甚感痛苦,但为求世界和平不得不如此。^①

以罗杰斯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虽与白宫有矛盾,但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与白宫是一致的,所以面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和质疑尽力予以安抚,以维护尼克松访华的成果。罗杰斯在向沈剑虹简报中国之行及《中美联合公报》内容的同时,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与基辛格的高级助手何志立也于3月2日下午抵达台北,先后拜见了台当局“外长”周书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及“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向台湾当局通报有关情况并答疑解惑。^②然而,蒋介石却取消了与他们计划中的会见^③。白宫战情室当晚向基辛格汇报称,蒋介石冷落格林是因为他想与基辛格会谈,蒋介石拒见格林是其故意对尼克松总统没有专门派个人特使赴台解释北京会谈的抗议,基辛格作为尼克松中国之行的设计师,本应作为尼克松的首选代表赴台。^④这一方面反映了蒋介石对尼克松政府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蒋对美国已失去基本的信任,对美方的通报不屑一顾。美方的通报和解释,在蒋介石看来,只是例行公事。蒋介石在听取蒋经国与格林会谈的汇报后认为,格林谈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经过及其与中共联合公报的解释,“听之而已”^⑤。

台湾当局虽不信任美国的通报,但确实担心尼克松访华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及连锁反应。为尽快打消外界对美国放弃台湾的疑虑,防止他国产生台湾被美国抛弃的误解,稳定台湾与“友邦”的关系,台湾当局在格林访台当天即电告驻外机构,要求他们向驻在国政府说明美方的通报和解释。电文指出,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业已访台,并与台当局“首长”晤谈,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也已会晤基辛格与罗杰斯,综合美方通报内容如下:(1)此次美中会谈及达成的联合公报,美国并未损害台湾的权益,美方珍视美台传统友谊,愿维持与台湾“外交关系”并遵守协防条约义务;(2)美方并未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表示其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及台湾为此中国之一部分,而仅谓台北与北京均如此主张,美方不表示异议而已;(3)公报中只提到美将从台湾地区全面撤军,但此乃必须等到整个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后之事,至于逐渐撤军,亦需等整个东南亚紧张局势缓和;(4)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方认为此五项原则本身均可接受,在公报中阐明可用作以后衡量中共的准则;(5)美方认为中共未在公报中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自台全部撤军并废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乃为中共对美国在台海维持军力及对该条约的默认,此乃被美方视为中共的一大让步;(6)尼克松此次赴中国大陆访问,中共竟能容忍美与台之关系,这使得美国以后继续支持台湾的政策在美国内较容易获得赞同,在此意义上,此行对台亦非不利;(7)美认为台北宜力持镇静,切勿擅自宣扬美国背弃台湾的论调,这对台有损无益。电报要求以上除(5)(6)两节外,其余各节均可酌情向驻在国政府说明,并设法澄清错误观念。^⑥

台湾当局不断要求美方声明其立场态度,并通过自己渠道向他国政府澄清美国立场,主要是担心其他与台湾友好的国家产生错误观念,误认为美国放弃台湾,进而对台湾与彼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此时沉浸在访华成功喜悦中的尼克松,也认为对台湾的安抚业已完成,无需再论及此事。他在3月6日接见沈剑虹时,重申了基辛格此前向沈剑虹所作的解释和承诺,同时警告沈剑虹如果台湾不停地提出美国的承诺问题,最后将遭致失败,那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⑦

与此同时,尼克松通知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和基辛格,表示他已评估了在中国高

①《尼克松“访匪”以来我政府首长与美方在华府重要会谈(1972年3月2日)》,第9—15页,台湾“外交部”档案(1928—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412.4/0033;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5, ft. 4, p.826.

②《外交—严家淦周书楷等与美方代表谈话纪录》,《蒋经国“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205-00092-007和009.

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15, ft. 4, p.858.

④Henry Kissinger is provided with information on world development, March 2, 1972, CK3100547203, DDRS.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3月3日。

⑥《格林访华(谈话记录)(1972年3月3日)》,第86—91页,台湾“外交部”档案(1928—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412.22/1360.

⑦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7, pp.837—840.

峰会谈的结果及国内外反应,令他鼓舞的是最初出现的忧虑已成功得到缓解,大部分积极成果总体得到认可。为避免损害美方的有利地位,他要求整个官僚机构中的每一个人,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在正式或非正式评论时都应当采取非常克制、自律的方式,不得进一步公开评论或阐述在中国进行实质性会谈或联合公报的内容,包括不得进一步重申维持美国的防御承诺;他认为任何进一步重申美国的防御承诺都是不必要的,只会冒遭致中方反驳的风险,会损害已取得的成就;他要求对这些问题的任何答复必须严格控制在2月28日他在安德鲁森空军基地所作评论的框架内。^①尼克松显然认为对盟友的安抚已告完成,因而不允许再重申美国对台承诺问题,他担心任何有关美中会谈实质内容的泄露或评论都会遭致中方的反应,从而对刚刚起步的美中关系造成影响。

四 结论

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当局虽对尼克松访华表示反对,但其并没有多少筹码与美国讨价还价,更无法阻止尼克松访华计划,只能通过向美国政府剖析利弊,以晓之以理的方式对美进行劝阻。台湾即使有交涉或抗议,其主要目的也是使美国重申对台协防承诺。然而,台湾当局的抗议和劝阻,丝毫未能影响尼克松访华计划的进行,美国政府反而对台湾当局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在设法安抚的同时,对其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警告其不得采取任何影响尼克松访华的行动。在访问后,尼克松政府虽通过多种方式安抚台湾当局,但重点仍在强调尼克松访华的积极意义,突出尼克松访华的必要性,同时许多实质内容上对台湾当局采取漏报、瞒报甚至欺骗的手法,以消除台湾当局的疑虑,避免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受到影响。

尼克松访华使得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对美台关系及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尼克松访华重塑了台海地区的关系结构,台湾作为美国对抗中国大陆“前哨”阵地的地位和作用大为降低,台湾当局依靠美国“反攻大陆”和对抗中国大陆的政策也完全破产,美台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对美国来说,台湾实质上从一个对抗中国大陆的“盟友”变成了影响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掣肘”;而对台湾当局来说,美国的这种“背叛”行为不仅使美台“盟友”关系名存实亡,亦使台湾成为美国可随时抛弃的“棋子”。当然,这也为两岸关系的缓和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外部环境,从而为后来两岸关系解冻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台湾的“背弃”行为,也使得台湾当局进一步认清了美国政府的本质及台湾自身的地位,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的决心。1972年3月1日,蒋介石在准备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讲演词时就认为:“国际间变化多端不测,万事未可逆料,尤其是国与国间之交涉绝无信义,其言更无道德可守,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方能独立生存于世界。”^②至此,台湾当局开始把注意力从“反攻大陆”转移到台湾岛内发展。1972年6月,蒋介石进行重要人事调整,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批台湾本土派官员进入台湾当局政府机构。这为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促使台湾当局朝向更为“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亦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doc.206, pp.830—831.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2年3月1、4日。